

徐松石民族學文集 上卷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粵江流域人民史
泰族僮族粵族考
日本民族的淵源





徐松石民族學文集

上卷

◎ 《壯學叢書》編委會編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桂林·

圖書在版編目(CIP)資料

徐松石民族學文集／《壯學叢書》編委會編·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9
ISBN 7-5633-5709-2

I. 徐... II. 壯... III. 民族學--文集
IV. C95-5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資料核字(2005)第 106326 號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廣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號 郵遞區號：541004)
(網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啓明
全國新華書店經銷
廣西民族印刷廠印刷

(廣西南寧市明秀西路 53 號 郵遞區號：530001)

開本：787 mm×1 092 mm 1/16

印張：77.75 字數：1 300 千字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價：168.00 元(上、下卷)

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影響閱讀，請與印刷廠聯繫調換。

出版說明

徐松石先生是著名的民族學專家，長期從事嶺南民族歷史文化的研究，寫下了一批在學界較有影響的專著。他還在東南亞民族史研究、中國與東南亞民族關係史研究上作了許多卓有成效的艱辛工作，他致力倡導並努力實施的“地名研究考證歷史法”的成就尤為學界所矚目。鑒於徐松石先生在嶺南民族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及贏得的聲望，結集出版他多年來的研究著作，既是徐松石先生成果的展示，也是學界的支持和肯定。本書的出版對於壯族歷史文化研究以及嶺南民族史、中國與東南亞民族關係史研究的進一步開展都具有積極意義，也必將產生特定的影響。

本書專著部分以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徐松石民族學研究著作五種》及《華人發現美洲概論》，香港《東南亞研究所叢書·禹迹華蹤美洲懷古》為主要工作底本，論文部分以香港《東南亞學報》《東南亞研究通訊》刊載的徐松石論文為工作底本，以中華書局民國三十年版的《粵江流域人民史》及香港《東南亞研究叢書》中徐松石著作《粵江流域人民史》《泰族僮族粵族考》《東南亞民族的中國血緣》等書進行校勘，同時通讀全稿進行理校，對文字錯誤徑直改正（如“烏田”改為“烏田”，“唐宋五代”改為“唐末五代”等，所作改正散見於本書，不一一列出），不做校勘記。根據中華書局民國三十年版《粵

[出版說明] ·····

江流域人民史》，補入“第二十三章桂平都合文化探討”“第二十八章全書提要”“附錄徭民榜令文件、苗民譜本”“跋”等，以呈現徐松石著作原貌。

將《教師·牧師·學者徐松石》一文和徐松石若干圖片置於書稿正文前，以介紹作者生平，有利於讀者理解全書。

根據徐松石先生的意願，我們對原著不作修改。僅對書稿進行如標點符號的處理，改正錯字等編輯加工技術處理。由於書稿是徐松石先生多年前的著作，關於民族的劃分，徐先生取孫中山先生五族共和之原則，這是時代的烙印，書稿中的有關觀點，從今天研究成果來看有不準確之處，屬於學術探討範圍，不必諱言，因此沒有作修改和注釋。讀者自會理解和思考。

經《壯學叢書》編委會的資助，並經徐松石先生親屬的授權，我社將徐松石先生的民族學研究著作和論文結集再版，並在徐松石先生誕辰 105 周年之際發行，以表達廣西出版人對本地這位著名學者的敬意，也是我們為民族文化事業所盡的微薄之力。

序

張聲震

我接觸徐松石先生的著作始於二十年前，廣西壯族自治區民族事務委員會的同志給我推薦徐松石著作《粵江流域人民史》，其時正值我開始致力整理廣西少數民族文化遺產和編撰《壯族通史》，自知平生學識淺薄，我抱著求知的渴望去閱讀這本名家大著。印象裏，首先是徐松石先生著述敘事流暢易讀的文筆，樸實的文風，淵博的知識，簡明新穎的篇章結構，多學科有機結合論證問題的研究方法，“僮爲嶺南土著”的總觀點像磁石般地吸引著我，令我手不釋卷地直讀下去；然而最令我十分驚訝的是徐松石先生在《粵江流域人民史》的“跋”上表露的對壯族人民的自然真摯的感情，他寫道：“作者祖籍粵東新興而分居梧郡，因爲女性祖系的遺傳藐躬有深濃的壯族血液流貫”。“引爲生平無上的榮耀。”徐松石自稱“屬客家族，遠代祖先，世居廣東蕉嶺縣”，“明末清初，先人的一位，遷居於廣東肇慶府新興縣”，清康熙十二年（1673），新興徐氏族人的一支落籍于廣西容縣。無論是蕉嶺、新興或是容縣，均屬嶺南，先秦時代，都是

壯族先民越族生息之地。徐松石確認，越族爲嶺南土著，淵源久遠，包括客家的中原人南下嶺南乃是秦始皇統一嶺南以後的事，南下的中原人與當地越人通婚繁衍後代，已是亙古以來認爲很自然的事，徐松石感悟到自己屬祖輩與當地越人通婚的後裔，因而意識到自身“貫流著壯人的血液”聯想推究到整個粵江流域人民史，“有三件事使我驚心動魄，”一、驚歎粵江流域基本部族爲壯族（先民），自虞夏商周以降，嶺南區域百粵種，都以今日所謂僮爲主。二、驚歎壯族同胞潛蓄力量的恢宏磅礴，近代所謂兩廣精神，根本就是壯性的發揚光大。三、驚歎壯族同胞今後的機會奇偉（《粵江流域人民史》“跋”末頁 中華書局民國三十年版）。徐松石因是以“自身有壯族血液貫流而引爲無上榮耀”。讀後驚訝之餘，我在尋思：徐松石是一位有高度文化素養的漢族學者，他能發現自身有祖輩女性的壯族血液流貫，證明他是極具唯物主義精神的智者，而在那素以排除異類爲正統思想的社會，他敢於公開坦率承認，則可稱爲知識界之勇者，然而他竟不止於此，發出“引爲無上榮耀”之感慨。令人感到徐松石對壯族的濃厚感情，決非純出於血緣感悟，而更多是出於對壯族及其先民的遠見卓識，可稱爲知識界的仁者。從徐松石的壯族血緣感悟昇華，令人感到他確具智、仁、勇之風，與衆不同，實堪稱之爲知識界的佼佼者。

隨後，接著讀徐著《泰族僮族粵族考》，此書成於 1945 年 10 月，讀後發現，徐松石先生對壯民族有崇高讚譽，他在本書“僮族的優點”一節中，概括出壯族有文化悠久，歷史綿遠，民性優良，力量宏厚，對國家貢獻極偉大等八大優點。更重要的是他發現“今日嶺南人，包括兩粵（兩廣）地方居民，還帶著 70% 的僮族血質，我們看見粵族同胞的活耀，就不能不承認僮族的優秀。”他預見“將來中華民族國防建設上，僮族健兒必將有驚天動地的貢獻。”讀後令我肅然起敬，徐松石考察、研究粵江流域僮族、“粵族”及泰族並著書立

說的年代爲 1939 - 1945 年，其時正值日寇侵華，國家災難深重之秋，當局號召全民抗戰，爲緩和與少數民族的對立，雖已明令對少數民族稱呼不再持“𧆳”（野獸）而代之以“亻”旁。但國民黨實行的民族壓迫政策實質不變，廣西當局只承認有講僮語的人，而無壯族之稱，當局認定“僮族已漢化了”，民國卅四年（1945 年）廣西年鑒記載廣西壯族人口只有 18000 人，分佈於龍勝、忻城、羅城、宜州等縣，當局把這些“殘存”的僮族和瑤、苗、侗等列爲“特種民族”，而所謂“特種民族”概念，其意與歷代封建王朝視“蠻夷爲禽獸，非我族類也”的民族觀是差不多的。我當時正就讀於邕寧縣立國民中學，在本地從事地下革命活動。我清楚自己是世代代講壯話人的子孫，親身感受到“土佬”受官家、城市人歧視的滋味。正是在當時如此的社會環境中，徐松石先生作爲一個有良知的漢族學者，對壯族能獨樹一幟地作出這樣的評價，說明他能發現真理，並且敢於堅持真理、宣傳真理，可謂史無前例。所以，我及壯學界同仁，從編撰《壯族通史》時起，早就推崇徐松石先生爲壯學先驅！

及至 1993 年元月，廣西博物館館長蔣廷瑜先生傳來徐松石先生從美國寄來的手迹並空郵送我《粵江流域人民史》《泰族僮族粵族考》二書修訂本。我終於有緣與徐老先生直接通訊。1993 年 3 月初，我給徐老先生去一信，順將我近年整理廣西少數民族古籍的一批成果贈予，非常遺憾的是，所寄的信、書，徐先生都未收到，失落了。至 1994 年元月下旬，徐先生在致蔣廷瑜先生信中囑託蔣將廣州中山大學蔡鴻生教授爲出版《徐松石民族學研究著作五種》所作之序文轉交予我。於當年二月下旬，我給徐寫第二封信，又再次將我多年整理廣西少數民族古籍多種成果寄贈。當年 6 月 7 日接徐老先生 5 月 7 日復信，說“閣下華翰已經妥收，但書籍尚未接獲。”復信中重提他“因有歷代母系關連，微軀肯定也有僮族血緣，引以爲幸。”“平生喜愛學術研究近仍鏗而不捨。對於僮族往史的研討，

興致特深。年來並兼致力於華人發現美洲的探討。最近已經證明美國最強大的印第安族,乃是中國嶺南僮族先人的子孫。”“證據非常確實。”未久,6月21日又接徐老先生第二封信(6月14日發出)。信中說“(1994)6月12日三藩市郵局送來閣下所贈的四本書①古壯字字典②布洛陀經詩③左江流域崖壁畫考察與研究④壯語地名選集。覽閱之下,琳琅滿目,堪稱偉著,深感盛意。”“閣下對於壯族史的研究和著作,極有貢獻和價值,私衷異常欽佩。深望繼續領導一切,增加祖國的光彩。”閱後至感欣慰的是,壯學同仁們在新時代步這位先驅後塵、艱辛致力得到的壯學新成果,終能使遠在海外的徐老先生親眼看到了一些。從其復信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老先生看到壯學新成就“深感盛意”的情懷!致對老先生“琳琅滿目堪稱偉著”的讚譽,誠可理解為是對壯學方向和成就的肯定和贊許。當年6月份連接收到徐老先生兩信並詩,感奮倍加,遂於當年7月初旬給徐老先生寫第三封信,表達對其深情厚意讚譽之謝忱,並向老先生詢問美國印第安人的語言是否有中國嶺南僮族先民越人語言的痕迹,順和其詩一首,詩雲:“讀罷宏篇淚欲零,血緣終自系心聲。天涯莫歎遺霜鬢,學海揚帆大業成。”信於當年7月12日寄出。可惜以後便音訊全無了。至上世紀末,始聞徐老先生已百歲作古,不禁悲喜交集之情油然而生。

徐松石先生辭世已6年,然而衆多壯學界同仁與我一樣仍感覺到徐松石的精神依舊活在我們心中。首先是徐先生70年畢生開創的嶺南民族研究及中國嶺南與東南亞民族關係研究成果,在當今中國-東盟構建自由貿易區、廣西南寧正成為中國與東盟緊密聯繫的重要樞紐的新時代,正在重放光彩。其研究領域的業績,今天民族學界、史學界尤其是壯學界仍在繼承著,發展著;儘管徐松石是一位誠摯的佈道牧師,然其民族平等觀和馬克思主義的民族觀是一致的。而就其為人為學的品格和學識的淵博上說,更堪稱壯學界之楷

模！徐松石治學的中西結合的研究方法（傳統史學，文獻考證與田野調查結合），尤其是他獨創的“地名研究考證歷史法”，則一直為壯學界所弘揚和運用；再者，我和眾多壯學同仁一致認為，徐松石先生在研究粵江流域民族中所闡發的“僮族血緣榮耀觀”、“僮族優秀論”、“兩廣居民含 70% 僮族血質論”的思維觀念，乃是促進嶺南民族團結的最大動力源泉。根據胡錦濤同志最近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講話“牢牢把握各民族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的主題”精神，我們正應積極弘揚徐松石的思想，把嶺南民族團結推上更高的臺階。從而對嶺南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與和諧社會建設，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更輝煌的貢獻！

我們說徐松石先生精神一直活在我們心中，絕非虛言。今逢徐松石先生誕辰 105 周年，為了紀念這位壯學先驅，廣西壯學學會、《壯學叢書》編委會特意將《徐松石民族學文集》編輯再版，並聯合廣西民族學院、廣西歷史學會舉行徐松石紀念會暨學術研討會，我以為很是值得，因為當今時代仍需要徐松石！需要徐松石精神！

（張聲震，研究員，廣西壯族自治區原副主席，
廣西壯學學會名譽會長，《壯學叢書》總主編）

教師・牧師・學者徐松石

黃 錚

徐松石，廣西容縣人，生於 1900 年 11 月 13 日，終於 1999 年 6 月 14 日。是與 20 世紀同行的知名教育工作者、神學工作者、民族歷史學者。徐松石自稱“屬客家族。遠代祖先，世居廣東蕉嶺縣”。“明末清初，先人的一位，遷居於廣東肇慶府新興縣”。清康熙十二年(1673)，新興徐氏族人的一支，落籍于廣西容縣，為容縣徐氏始祖。傳至徐松石為第 10 世。徐松石的父親徐玉其，是清代秀才，曾留學日本，“得新空氣之先”。壯年時在梧州經商，常常奔走於梧州、廣州、港澳等地。母親甘淑慈，祖籍廣西容縣。徐松石出生於廣州，幼年時曾在家鄉廣西容縣及香港讀書。1915 年，徐松石 15 歲時，隻身自香港到上海求學。次年考入滬江大學預科，1918 年升入滬江大學本科，就讀於社會教育系，1922 年畢業。

滬江大學是教會辦的學校。在這裏，徐松石開始接觸基督教，並於 1919 年正式加入基督教會。徐松石從小受過嚴格的語文訓練，國學基礎比較紮實。故在大學二年級以後，經批准得以免修國

學課程,增修神學課程,由此打下了神學的基礎。徐松石自少年時期起便酷愛寫作。在滬江大學讀書時,曾任校刊《天籟》主筆。徐松石在滬江屬自費生,學雜膳費均需自理。由於父親的生意不好,故徐松石不得不常常向報刊投稿,以稿費收入補貼求學的開支。當時上海各家日報的副刊,全國青年會在上海辦的月刊,商務印書館辦的月刊,以及廣協書局、商務印書館等報刊和出版社,徐松石都曾投寄文章或書稿。徐松石的大學時代,正是“五四”運動爆發前後,各種新思想、新學術潮流激蕩。徐松石在報刊發表的文章,能夠順應和反映時代的要求和呼聲,因而受到矚目。徐松石與滬江大學的另外兩位“喜愛拈筆操觚者”,贏得了“滬江三才子”的讚譽。徐松石本人更被推薦擔任“五四”運動後上海學生會書記之一。1921年,徐松石大學尚未畢業,就寫出了平生第一本著作《新教育理論》,由上海廣協書局出版。當時,西方近代教育原理、教育制度在中國還是新生事物。徐松石這部著作的出版,頗受關注。次年,徐松石又有兩部教育方面的譯作分別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和廣協書局出版。

徐松石在滬江畢業的前一年,廣東美華浸信會印書局派人到上海物色編輯人員。滬江大學校長魏馥蘭博士鄭重推薦了徐松石。1922年,徐松石大學畢業,即應聘擔任了美華浸信會印書局上海編輯部主任,在這個職位上幹了5年。主要工作是編寫印行教會學校的各類課本。此期間,徐松石熱心教會工作,編譯了許多聖詩,翻譯過作為教會師範課本的《實用兒童教育學》一書,參與組織成立了中國第一個基督教文社,擔任了上海廣東浸信會執事。1924年,徐松石與郭琪芬女士結婚。郭祖籍廣東番禺,在上海出生長大,曾就讀於上海浸信會晏摩氏女子中學。徐郭自此相依相伴凡七十五載。

1927年,徐松石辭去上海浸信出版部的工作,受聘擔任了教會

學校上海崇德女子中學校長一職，並一直幹到 1952 年。1927 年至 1952 年的 25 年間，中國經歷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等重大事變，可謂“天翻地覆慨而慷”。在徐松石人生旅途中，也度過了青年到壯年時期。在 25 年的悠悠歲月中，徐松石一邊面對時局的動蕩、家庭生活的重擔，一邊醉心於教育工作、教會工作，以及對民族歷史的研究。華路藍縷，倍嘗艱辛，卻又樂此不疲，未曾稍懈。

此期間，徐松石曾一度告假赴美國留學，就讀于田納西大學，獲歷史學碩士學位。

此期間，徐松石一度告假赴印尼蘇門答臘，為華僑總商會創立蘇東中學，並擔任該校首任校長半年多。當時，印尼尚處於荷蘭殖民統治之下，由徐松石幫助創立的蘇東中學，全盛時期有學生數千人。

此期間，徐松石一邊領導著崇德女中，一邊應聘擔任滬江大學、之江大學、華東大學教授，並曾於 1937 年上半年接受嶺南大學鍾榮光校長聘請任該校教授。只是由於“七七”蘆溝橋戰事爆發，交通受阻，而未能南行。

此期間，徐松石一直熱心教會工作。他正式成為上海浸信會牧師，並擔任上海基督教中學聯誼會主席，華東（七省市）基督教教育會會長，還一度兼任上海浸信會《真光》雜誌總編輯。抗日戰爭期間，徐松石曾與聖約翰大學校長一起，積極辦理教會學校對戰時難民救濟事宜，對同胞在戰亂中的種種疾苦給予了深切的同情和體恤。抗戰期間，徐松石曾兩次到西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佈道。抗戰後，又曾赴臺灣作短期福音旅行，為加入基督教的兄弟姐妹施浸禮。

此期間，徐松石潛心研究自己所喜愛的民族歷史問題，寫下幾部極有價值的學術著作，由此奠定了他作為我國著名的民族學家、歷史學家，研究嶺南民族歷史文化的著名先驅的學術地位。

徐松石研究民族歷史問題，除了重視文獻資料的發掘、分析之外，十分重視田野考察、社會調查。20 世紀 20 年代至 40 年代初，徐松石曾多次深入我國西南邊疆民族地區進行社會調查。

1927 年，徐松石曾在廣西的桂北地區進行歷時數月的民族歷史調查。

1935 年，徐松石又一次來到廣西，在南寧和左右江流域的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社會調查。

1938 年春，徐松石趁赴我國西南地區佈道之便，在廣東、廣西、湖南、貴州的少數民族地區進行調查，具體路線是：先在廣東南路考察，然後進入廣西，由桂林出發，經桂北、湘西、黔中、黔南、桂西、桂中、桂東南，再回到廣東南部。行程數千里，深入考察了瑤族、苗族、壯族的聚居地。還在廣西桂平考察了出土銅鼓和古代留下的石刻等。

1940 年暑假，徐松石又一次利用赴西南地區佈道之便，自桂林到柳州，然後在桂北、桂西以及桂、黔、滇交界的民族地區進行歷時數月的社會調查。

徐松石 1938、1940 年的兩次社會調查，正當日本帝國主義擴大侵華戰爭造成中國大地“羽檄紛飛，烽煙滿目”的歲月。徐松石隻身旅行數千里之遙，其中經歷的種種艱辛與險阻，可想而知。然而，正是由於這樣的社會調查和採訪，使徐松石取得了十分豐富的關於民族歷史的實證材料，大大開拓了徐松石的研究思路，從而使徐松石收穫了豐碩的研究成果。

1938 年，徐松石所著《粵江流域人民史》一書，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該書出版不久，就有日本學者將其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書名改為《南支那民族史》。

1945 年，徐松石又寫成《泰族僮族粵族考》一書，作為《粵江流域人民史》的姐妹篇。這本書由上海中華書局於 1946 年出版，1947

年獲中央政府教育部的學術著作獎。

1952年起,徐松石不再擔任崇德中學校長。一連5年,徐松石在家“閉門修養”,偶爾參加教會活動,而對民族歷史的研究,則始終沒有放棄。就在這幾年間,徐松石陸續寫成了以下4部書稿:《東南亞民族的中國血緣》、《臺灣土著考》、《嶺南銅鼓研究》、《日韓通古斯民族的淵源》。

1957年3月,徐松石獲准赴香港定居。到香港後,他“專心傳道著述”。徐松石擔任了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教授,尖沙咀浸信會主任牧師,亞洲浸信會科學研究院董事、亞洲浸信會出版部負責人等職,並常常赴東南亞各地講道。徐松石到香港後寫下宗教書籍多種,均由浸信會出版部印行。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一書。

整理、撰寫和出版民族歷史方面的著作,是徐松石到香港後傾注極大熱情投入的另一項工作。

到香港的當年,即1957年,徐松石首先將幾年前寫下的《東南亞民族的中國血緣》書稿進行整理,並將《臺灣土著考》書稿節錄附後,在香港正式出版。

1960年4月,徐松石在香港應宋哲美教授之邀參與創辦東南亞研究所。宋哲美教授任所長,徐松石教授任導師兼歷史研究室主任。

《東南亞民族的中國血緣》一書在香港出版後,徐松石又將1938年和1946年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粵江流域人民史》和《泰族僮族粵族考》重新加以修訂,“根據新獲心得,加以相當增減”,於1963年由東南亞研究所列入東南亞叢書出版。

1966年,徐松石在香港寫成《日本民族的淵源》一書,由東南亞研究所列入東南亞叢書出版。

1974年,徐松石將50年代初寫下的《嶺南銅鼓研究》舊稿加以

整理修改,形成《百粵雄風,嶺南銅鼓》書稿,仍由東南亞研究所列入東南亞叢書出版。

在香港,徐松石還撰寫了不少民族歷史方面的學術論文。1965年1月,東南亞研究所創辦《東南亞學報》。徐松石在該學報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七期,接連發表了以下7篇學術論文:《爾雅裏面的泰國語音》、《泰族與嶺南的關係》、《透視東南亞民族》、《東南亞民族語言的特點》、《東南亞民族的遷徙路線》、《東南亞的銅鼓民族》、《匈奴蒙古民族考》。自1970年1月起,東南亞研究所不定期編印《通訊》,徐松石在該刊發表了《伏羲盤古考》等文章。

1975年,徐松石75歲,在香港正式退休,並於同年11月移居美國三藩市。然而,到美國後,徐松石並未安享晚年,正如他自己所說“雖雲退休,忙碌依舊”,佈道與著述兩件事,“仍未嘗稍輟”。

在三藩市,徐松石被聘為自立浸信會顧問牧師,經常被邀請到美國和加拿大一些城市講道。而香港和尖沙咀的浸信會也不時邀請徐松石返港講道或主持培靈會。在研究工作方面,徐松石利用在美國居住的方便,將關注的目光轉向自己早就希望涉獵的美洲印第安人與華人淵源問題研究。事實上,早在上個世紀20年代徐松石在美國留學期間,就已對印第安人與華人淵源問題有了初步的觀察。70年代中期以後,徐松石連續用了好些年對這個問題進行深入探索。他把對中國古代文獻的鑽研,與對美洲印第安人的田野調查結合起來,進行綜合研究,從而在80年代初寫成了《華人發現美洲考》的中英文書稿。這部書稿於1981-1985年間在香港分上、中、下冊陸續出版。這是徐松石晚年在美國完成的又一項新的民族歷史問題研究成果。

1985年7月,當徐松石在三藩市收到從香港陸續寄來新出版的《華人發現美洲考》時,已是85歲高齡了。徐松石曾經說過,他是1926年開始研究民族歷史問題的。那麼,下一個年頭,即1986

年,便是自己從事民族歷史研究的 60 周年了。回憶 60 年的風雨歷程,徐松石百感交集。但在學術田園辛勤耕耘的收穫,也讓這位老人覺得苦中“自有一番喜悅”。他想到,如果將自己半個多世紀來的學術著作擇其要者,出一個合集,既可作為紀念,也是對學術界的一個貢獻。於是他給在香港的學生、留美學人、知名地鐵工程師詹益邦先生寫信表達了這個意思。他在信中寫道:“我 60 年來致力於遠東民族史的研究,寫了專著 8 本,都是嘔心咯血的作品。清風兩袖,始終是一介寒儒。但內心熱愛中華民族和中國固有文化,向來認定華人是一個偉大的民族。遠東民族史的研究和美洲史前史的研究,清楚證明了這點。但凡對於國家民族有光彩榮耀的學術考證,我都樂意去略盡綿力。就在這種刻苦平淡中度過 60 年之光陰,其中自有一番喜悅與情趣。明年是我開始遠東民族史研究寫作 60 周年紀念。未知有否可能募集款項,將以前民族史拙著出一合集,以供各方之需,而略盡對學術界貢獻綿薄之力也。”這是一位 85 歲老者的肺腑之言,凝聚了徐松石對中華民族深沈的愛,以及向學術界奉獻心力的良好願望。詹益邦先生曾任香港東南亞研究所董事會董事長,一向對老師的道德文章推崇備至,多年來也為徐松石多種著作的問世出錢出力,多方操持。這一次,又是在詹先生奔走推動下,以及在中山大學歷史系蔡鴻生教授、陳春聲博士的幫助下,最終與廣東人民出版社達成了彙編出版《徐松石民族學研究著作五種》的協定。這五種書包括:《粵江流域人民史》、《泰族僮族粵族考》、《東南亞民族的中國血緣》、《日本民族的淵源》、《百粵雄風,嶺南銅鼓》。徐松石親筆擬了給廣東人民出版社的“授權書”,並為自己的“五書合刊本”新寫了一篇“自序”。在“自序”中,徐松石不僅用心勾劃出一些十分值得重視的學術觀點,同時又一次坦露了他對中華民族赤誠的愛心。“自序”總結語的一段寫道:“我愛中華民族,我愛五族同胞,我愛漢族內許多較小的部族,我也深愛海外具有